

=====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〇七〇）·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二三八期（zk2009b）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风雨人生】	罗时钧受尽酷刑家破人亡	滕叙尧
【史海钩沉】	一九七四年复旦一场荒唐的教授考试	李北宏·葛剑雄
【往事非烟】	一个白洋淀女文青的心路历程	潘 婧
【青春有悔】	半透明之夜	杨 瑞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风雨人生】

罗时钧受尽酷刑家破人亡

· 滕叙尧 ·

（哈尔滨局式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成了“对敌斗争”的先进系，不仅把一批中青年教员关进牛棚，而且名牌教授也被斩于马下。著名的空气动力学专家，钱学森先生的高足罗时钧教授没有躲过家破人亡、九死一生的命运。

一、冷怀莹被逼自尽

文革前，罗时钧住的那栋楼里搬来一户新邻居，男的是刚提职不久的副教授，女的姓刘，是个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孩子多，没有工作，在哈军工老红楼居委会里找点差事干干。

罗时钧的夫人冷怀莹是位大家闺秀，才貌出众，气质高雅，在哈军工老教授的夫人中是数一数二的。那位刘某自惭形秽，嫉恨在心。

文革狂潮席卷哈军工的时候，刘某扯起大旗造反，成为哈军工居委会中响当当的造反派，她首先要揪斗冷怀莹，整治一下这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娇婆娘。侮辱人格，揭露隐私，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刘某使出浑身解数，一步一步把冷怀莹逼到绝路。1967年，冷怀莹精神几近崩溃，最终被迫害致死。

上蹿下跳，兴风作浪的刘某，专门斗争哈军工老教师的家属，祸害一方，长达两年。1968年，刘某在门诊部偷药被逮住，人们这才搞清楚，原来她并不是贫农出身，其父是个被镇压的恶霸地主，这个疯狂的造反婆娘才被揪了出来。

罗时钧自夫人撒手人寰后，留下三个年幼的孩子，人亡家破，他万念俱灰，像一片树叶在文革的狂涛巨浪里漂浮，他没有参加哪一派，老老实实接受批判。

二、罗时钧受尽人间酷刑

“清队”一来，罗时钧大难临头，他的罪名是“美、蒋双料特务”。他1950年从美国回国，途经日本被扣押这件旧事重新被立案审查。本来罗时钧这段经历是各级党组织都知道的光荣历史。然而，工宣队头头亲自上阵，大呼小叫：“你为什么放弃在美国的优越生活回国？”“你在东京是不是接受新的任务？”

罗时钧专案组里的工人和学员，可能从《红岩》等小说中国国民党军统特务对革命者施加酷刑得到启发，用刑讯逼供创下哈军工清队运动的新纪录。

拳打脚踢、皮鞭、棍棒，那都是平常的“家常便饭”，罗时钧遍体鳞伤，两侧肋骨被打断七根。专案组又发明新的“招牌特餐”：其一掐喉咙，直到罗时钧快要窒息过去才撒手，从此罗时钧的喉咙被打坏了，说不了话。看你怎么当教师！其二不准睡觉，20来个专案组成员每人轮流提审一个小时，让罗时钧在日夜“车轮战”中生不如死。

种种酷刑都不能够让罗时钧承认自己是“美蒋特务”，专案组长和部下又想起新点子。

“给你洗洗脚！”专案组几个64级和65级学员把罗时钧按到椅子上，开始脱他的鞋。

“不用洗了。”罗时钧声音嘶哑，他感到蹊跷和不安，又不是晚上睡觉，洗什么脚？他挣扎着不让学员脱鞋。

一个叫姚家式的学员扯去他的破袜子，握住脚踝骨，又有几个学员弯腰伸手使力，把罗时钧的双脚死死按入一盆热气腾腾的开水中。

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罗时钧昏厥过去。

古典小说《水浒传》中有两个解差把80万禁军教头林冲的双脚按进滚烫开水中的情节，哈军工一系又重演了这段令人毛骨悚然的古代故事。

后人谁能够想象得出：中国文革浩劫中有一群年轻的大学生，竟用令人发指的残忍手段去摧残一个中国顶尖的科学家，难道这能说是出于他们对伟大领袖的崇拜？对革命理想的忠诚？对“阶级敌人”的仇恨？……

野蛮战胜了文明，兽性压倒了人性，良知屈从于阴谋，那就是中国的1968年。

小腿烫伤后，专案组并不认真给罗时钧疗伤，草草处理处理拉倒。他的小腿一直发炎变黑。和他关在一起的康继昌相对自由一点，每天尽可能多打点开水，帮助罗老师洗伤口。

直至1972年，已经西迁西工大的罗时钧教授在大荔农场劳动时，右下肢胫前区仍然溃烂流脓。卢性宁医生给他做了全面检查，证明他的下肢溃烂、耳聋、声音嘶哑等八项伤残病痛都源自1968年遭到专案组长期的刑讯逼供。

文革结束后，罗时钧办理了正式的残废证。（根据残废证照片，“残废情况”一栏里写着：“双肩关节、双耳、右侧眉、双脚等处受伤。二侧肋骨折断七根”，“残废等级”栏里写着：“三等甲级”。——编者）

□ 摘自滕叙究著：《哈军工文革简史》第七十九章

~~~~~  
【史海钩沉】

一九七四年复旦一场荒唐的教授考试

• 李北宏 • 葛剑雄 •

〔原编者按：1974年1月5日，104位复旦大学的教授、副教授被迫接受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考试”，不少年事已高的老教授如历史系陈守实先生拖着病体被拉到考场，考试内容为政治、语言、数学、物理、化学，结果及格者仅7人，还有7人拒绝交卷。复旦大学外语系和中文系教授、语言学家李振麟亲历此次荒唐的考试，其子李北宏根据父亲的回忆撰写《1974年复旦一场荒唐的教授考试》一文。后葛剑雄教授看到此文，深有感触，摘录其师谭其骧先生1974年1月日记中所记关于此次考试的内容并作解读，以为佐证。现将两篇文章一同刊发，以飨读者。〕

◇ 一九七四年复旦一场荒唐的教授考试——李北宏

1974年1月5日，复旦大学开展了一场“教授考试”的闹剧，我的父亲李振麟亲身经历此事。

▲ 是考试，还是灭“威风”？

那天，我恰好在家。父亲李振麟（语言学家，复旦大学外语系和中文系教授）说：“接到复旦通知，今天要去学校听‘市革会’领导的报告。”于是骑上我自行装配的26英寸永久自行车前往学校了。

待父亲回到家中，他满脸不悦，只说一句“搞突然袭击”。等到他平静下来，我们细细询问才知道了一些情况。原来，当天学校请他去听报告是假，其实，是让他和复旦一些教授、副教授接受一场“文化考试”。父亲由于毫无准备，心里也有抵触情绪，很是不快。他说：“我一生考试都很顺利，而这样的袭击让人无法接受。”“卷子上标有‘大学入学考试’，这分明是捉弄人嘛！”父亲说到，当年，清华考数学、国文两门，国文题目是《梦游清华园记》，还有是“对对子”，上联分别是“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要求对出下联，这种题目开放性很强，考的是能力；而复旦此次安排的教授考试虽是一张卷子，上面有“政治、语文、数学、理化”，考的内容倒是不深，以记忆为主，不是考智力、能力，做法很不公道。

事后，我问了邻居伍蠡甫（画家、翻译家）伯伯，他对我很坦率地“口无遮拦”：“人家要考倒你，灭你威风嘛！”

▲ 一场考试仅有7人及格

据了解，这次考试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和上海市教育革命委员会组织的，当天在上海18所高校、600多位教授和副教授中进行，其中复旦有104位，占了不少名额。从复旦考试的情况看，及格者仅7人，还有7人拒绝交卷，这在当年是个勇敢的举动。全上海90%的教授考试不及格，可以看出大多数教授的“不配合”也是十分明显。父亲曾告诉我，周谷城教授在一道填空题“文化大革命涌现出了\_\_\_\_\_组织”，把应该填作“造反派”的填写为“造化派”，他不可能不知道“造反派”这个名词，自然是有意为之。

还有位中文系教授更是在卷子反面写歪诗一首，诗曰：“突闻考试实堪惊，此事当年害学生。今日临头识此味，从今开始学新人。”说实在的，这首打油诗写得太一般，也许是故意为之。不过，该诗还是引起北京高层的关注，该卷子被送到京城调阅，中国历史博物馆甚至还提出收藏，要作为反面教材。

教授考试影响极坏。特别是复旦教授中当时有不少人年事已高，多数已过70，把他们拉到考场，也太不人道。据胡绳武儿子回忆，当年教授考试，他父亲在现场，朱永嘉作为上海市领导也莅临。有这么一个细节，朱永嘉看到自己的老师陈守实教授踏着蹒跚的步履而至，于是使个眼色对相熟的当年地下党外围胡绳武说：“不是陈先生身体不好吗？怎么也来了，你陪他到医务室去看看医生。”父亲胡绳武心领神会，扶着陈教授出了考场，算是躲过一劫。这说明，朱永嘉面对老师有了恻隐之心，不忍将他推进火坑。

### ▲ “教授考试”背后的势力交锋

为什么上海会有这么一场闹剧？其实它有着不一般的背景。1973年，邓小平复出，在他主持和周总理的支持下，国务院批转了《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对两年前开始实行的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的内容。出于反对周恩来的目的，江青等看到《意见》便开始密谋。这时，毛远新从辽宁赴京，与江青一伙沆瀣一气，诬蔑文化考查是大学招生的弊病，是“智育第一”“文化至上”。于是，当锦州市招生办公室负责人谈到一个生产队长张铁生答不出卷子给领导写信一事时，毛远新如获至宝，当晚命令把考卷和信火速送来。于是，“反潮流”英雄张铁生被制造出来。而“反潮流”这个特有名词是毛泽东发明的，毛说过：“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

在“张铁生事件”发生后，毛远新率先在把持的辽宁省沈阳医学院以开会的名义把教授骗到学校进行了所谓文化考试。事后他说，各校都可以开展。1973年12月12日至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突然谈到了“张铁生的信”。他说：“不要看不起‘儿童团’，在北京要把八大学的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目考他们。”北京的动作够快，当年12月30日，即对600多名教授进行突袭，也如法炮制，把教授骗到学校进行考试。北京教授、副教授有骨气，彼此之间并无商量，竟有200人“学习”张铁生交了白卷，其中有两所高校教授集体交了白卷。

### ▲ 京沪教授大不同

从上海教授和北京教授的不同表现，似也可从中看出这一群落的不同点。上海是“四人帮”重镇，各方面管控显得更加严厉，而北京各派政治力量暗中角逐，使得北京教授在夹缝中尚有喘息空间，上海的政治空气更为压抑，教授日子更不好过，唯命是从是大多数。又可以从京派和海派文化上去找原因，上海成为通商口岸100年，首先是“商业竞卖”，其次，才讲“名士才情”。北京则不一样，基础巩固，教授的薪金比上海丰厚，完全不用投机、看风，更看重名节。从两地民众的处事风格看，京人直来直去，少含蓄；沪人则不和你来明火执仗，而是暗渡陈仓，从长计议。这是题外话。

荒唐的年代自有无尽的荒唐事，教授考试也算是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吧。

□ 原载《世纪》杂志2020年第2期

◇ 谭其骧日记中的“考教授”——葛剑雄

《世纪》2020年第2期所刊《1974年复旦一场荒唐的教授考试》，在先师谭其骧先生日记中的记录，可作为此文佐证，摘录以供读者参考。

（1974年）1月3日：傍晚束世澂（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通医术，谭其骧等常为本人及家属问医求方，一般登门。陈守实因年高病重，家人只能求束来家）、吴泽（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来，坐片刻，束应陈守老（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家之邀来视守老也。

1月4日：下午到学生宿舍参加学习元旦社论。四点结束，至一舍（复旦大学第一宿舍，在国顺路）看望陈守老。

1月5日：上午1237教室（在复旦大学第一教学楼）举行教授副教授考试，考以本属各大学入学考题，政治、语言、数学、物理、化学。政治为社会主义时期基本路线、毛主席讲话原文及发表时间地点、列宁论帝国主义特点、《鞍钢宪法》、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语文为《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天问》《资治通鉴》《论衡》《聊斋志异》等作者及时代，数理化除一亩等于若干方丈外，其他题目看不懂。余所答基本路线只能举其大意，五特点只举其三，《鞍宪》未答，“三八”亦忘记一小半，数理化仅除亩积一条外全白卷。下午一办（上海市革委会第一办公室，主管文教）高飞来找余及全增嘏（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王福山（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来信指出王福山实为物理系教授，并非生物系教授——编者）、朱伯康（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四人座谈参加考试体会。早退，到保健科量压为90。

说明：谭其骧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文革”前任系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九三学社成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当时63岁，属已经“解放”“一批二用”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已恢复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工作，当年又被确定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前两天的日记证明，陈守实教授的确病得很重，家人已请他的老友、华东师大束世澂教授上门诊治。陈守实当年已81岁，又在病中，但接到“重要会议”的通知，还是不敢不参加。

那时我是上海市闸北区的中学教师，不久我们就听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有关“考教授”的讲话传达，讲了北京和上海“考教授”的结果。各类教授的数字早已忘记，但提到“有人立场反动，交了白卷”，也表扬了有的教授态度好，虽然做不出，还在试卷上写了一首诗谈感想。讲到上海部分，特别列举周谷城：历史系教授，连五四运动的年代也答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不知道，写上“不许随地大小便”。医科大学考一级教授，量体温时居然将肛表放在嘴里。物理系教授不会画简单的电路图，不会用万用电表。

□ 原载《世纪》杂志2020年第3期

~~~~~

【往事非烟】

一个白洋淀女文青的心路历程
——“文革”中的四封信补记

• 潘 婧 •

“文革”是远比战争更为复杂的现象。它曾使我们狂热，恐惧，怀疑。历史在此破碎。新时期贫弱的文学至今没有能力表现我们所经历过的，资料的收集和编撰则多多少少为我们留下了那一时期心灵的轨迹。而“文革”是不应被掩埋的历史。

我们这一代人似乎有一种“文革情结”，或许人总是迷恋自己的青春，有一次经过宽街的“老三届”饭馆，忍不住进去，墙壁上挂着背包、草帽、小红本语录，录音机放着摇滚味道的革命歌曲，菜单上有一道“酸甜苦辣大杂烩”；而我们对往日的回忆，也总有一种说不清，理还乱的味道。青春年华流失于动乱的年月，这本是无可奈何的不幸，然而，艰辛与苦痛之中，自有一种新鲜而怪异的丰富；十年时光，我们似历经了一百年。

去年，在火车上认识几位来大陆旅游的香港大学生，听我讲插队的故事，这些在繁华而富庶的香港长大的孩子，惊叹之余竟有几分羡慕：我想肯定是我的叙述有问题，谈起往事，骄傲得如同在抚摩一个光荣的伤疤。

提起十年动乱，似乎只有灾难与压抑，狂热与失落，如某些伤痕文学、知青文学矫情地表现过的。那些故事总有些旧小说的伤感的俗套，而我们那时的生活是混乱的，不具形式，没有什么现成的故事框架可以把它装进去，“文革”以破坏与毁灭的形式开始，对于当时只有十六七岁的我们，最重要的也许是这样的一个影响：忽然脱离了常规的、惯性的轨道，不再有父母的管束，老师的教诲，没有人能够真正地左右你，面对着破碎的世界，你开始有了自己的理解与判断。

常常听到年长的人怀念1950或1960年代，似乎那是一个道德清明、理想纯正的时代，而“文革”仿佛是突如其来的怪物；殊不知正是始于1950年代的愚昧教育，才会有“文革”中的狂热的愚昧。“文革”将某种已经延续了十几年的体制和思想发展到极致，以一种赤裸的残酷表现了它的实质。所以从反面看，“文革”促进了觉醒；正如圆明园的废墟提示着耻辱，“文革”应提醒我们不要再陷入任何违反自然形式的愚昧。

然而，当徐晓执著地向我索取那些尘封已久的信笺时，我却颇费踌躇。最终交出的几封信，其中两人远走美国，早已断了联系，无法取得他们的同意，只有请求编辑将姓名虚化；第三位已不在人世，他是一位有才华的怪人，我相信是“文革”改变了他的人生之路，否则，他可能是一个卓有成就的科学家，或者是一位典雅的诗人。

如果没有这些已被时光作旧的信，青年时代的某些场景和细节也许会在记忆中流失；另一方面，我感到词语构成了一个与现实平行的世界，当我们给朋友写信的时候，我们关注的是精神生活的最深处；而生活并非全部如此。

一

戎是我在师大女附中的同学，是我青年时代最重要的女友；我说重要，而不是亲密，即使在少女时代，我们之间也从未有过一般女孩子的勾肩搭背的亲热。女人在结婚甚至在恋爱以后，就不再有同性的朋友；在此之前，友谊是情感生活乃至精神生活的最主要的内容。

我与戎同班，我们的接近是在“文革”以后。1967年群众组织派别林立，处于失控状态，对于我们这些中学生来说，颇有些多党自由的意味。戎当时算得上风云人物，可以伏在天安门前金水桥的石栏杆上一笔挥就一篇极有煽动力的讲稿；一旦失势，也有领袖人物的挺得住的气派。很难向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解释当年的派性斗争是怎么回事，其中既有扭曲的激情、肤浅的野心，也有源于个人遭遇的合理的要求。

混乱的局面造成了空隙和某种相对自由，激发了我们的活力。我借“串联”之机，走遍了大西南的美丽山川；戎则忙于做群众组织的领袖。1967年底至1968年，我们共同经受了压力，这或许是我们的友谊以及以后几年的患难与共的生活的基础。

重读她在1968年底写给我的信，那种现在看来似乎是自负的、政治化的语言的后，仍旧可以感到真切的情感色彩。那一年，我们19岁，即将离开学校去农村插队。“文革”伊始，我们的家庭都或多或少受到冲击；而我父亲的处境尤为糟糕；偶尔回到家中，压抑的气氛令人难以忍受；在我匆忙准备奔赴农村之际，得知父亲又被隔离审查；那一天返回学校，我穿上一件蓝呢外衣，试图显得精神些，以掩饰内心的虚弱。

那时我们已学会用调侃的口气叙说灾难，我笑着向戎说家里又出了事，说着说着，突然哭了。哭泣仿佛具有自己的意志，我束手无策地任凭眼泪像潮水一般涌出；戎默默无语地陪着我，我感谢她的沉默，感谢她没有抚慰的手势和话语，使我不至为自己的哭泣而羞愧。

以后，她当面递给我这封写于1968年最后一天的短信。她用那个时代的武断的语言表达了青年人应有的豪情，以谴责软弱来鼓舞勇气，“用安慰来平息痛苦，是庸人的做法，我们要用希望来充填思想上的空白……在苦难中，人成熟得更快……我相信我们永远是男子汉大丈夫式的朋友。”

如果不了解那个充满创伤的背景，这些话或许会显得空泛，当我们经受苦难时，我们反而不会叙说苦难，话语与现实是分裂的，伤感的回忆是在苦难结束之后。如今，所有的磨难都已消逝，年华却一去不复返，而我，将永远珍惜这份不会再有的情谊。

至今已有了关于北大荒、陕北和云南知青的纪实文学，似乎没有人认真写过白洋淀。白洋淀的北京知青大约只有几十个人，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或破落的干部子弟。这一小小的群体却有别于上述地区的几百万人，他们不肯接受硬性的指令和安排，试图脱离原来的集体，寻找一个相对自由的地方；于是，不约而同地来到白洋淀。

这似乎是一个理想的世外桃源，有着如诗一般的凄清的湖水；最初，是孙犁的散文使我们想到这片被称为“华北明珠”的地方。而后来，起始于1970年代初的“朦胧诗”就发起于久远而浪漫的湖水。我和戎来到这里的时候，是冬天，站在安新县城的堤岸上，远望一片冰原，穿着一身黑棉衣的农民划起雪橇，迅忽如弦上的箭，直射向湖心的村庄，冰面升腾的雾气凝结在柳树上，形成罕有的雾凇现象；十里长堤如同雕琢着玉树琼花。

似乎没有什么苦难能够泯灭青年人浪漫的情怀。随后的一个冬天，我们却体验了一种原始得近于残酷的物质生活。有一段时间，精神与物质，理想与现实都处于极端分裂的状态。

经历了一个全面的苦难，我们的精神陷入了一种困惑。而最终使我们冲破十几年的教育灌输给我们的思想模式，得益于两本灰皮书的点拨，一本是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不记得戎从何处借的；读过后，我们郑重其事地相约到颐和园，交谈彼此的感想，那是1969年的10月；从石舫远望长堤一带，秋天明丽而萧索，我们心情激动；托氏的书无疑是困惑之中出现的一缕明晰的光。那年的冬天，我又找到了德热拉斯的《新阶级》。至此，有关政治和社会的认识，我们终于摆脱了梦魇般的桎梏和愚昧。

那时，我们狂热地搜寻“文革”前出版的灰皮书和黄皮书；我的一个初中同学的父亲是位著名作家，曾任文艺部门的领导，我在她的家里发现了数量颇丰的一批黄皮书，记得当时

对我有启蒙意义的书是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叶甫图申科和梅热拉依梯斯的诗集，而当时在我们的小圈子里十分流行的《在路上》和《带星星的火车票》我却并不喜欢。我疑心当时在相当一部分人中流传的黄皮书皆源于此。

我和戎在本质上都是个人主义者，在我们自以为看透了社会以后，所关注的只有个人的精神生活。在农村，过着最底层的简陋而辛劳的日子，回到北京，便成了精神贵族；读遍了能够找到手的世界名著，只要有钱，就去“新侨”和“老莫”，我和戎轮流做东，当年物价之低廉现在是难以想象的，两块钱就可以在“老莫”帝俄风格的豪华大厅里坐一个晚上；至今背诵那时一餐的菜单和价目，如背诗一样美妙；我们喜欢泛着奶油香味的菜肴和银光闪闪的餐具，一本正经地呷着小杯的威士忌，仿佛不如此不足以抵偿在乡下度过的原始而粗糙的生活。

那时的生活多少有些模仿性和戏剧性；1949年以后，正常的，自然形式的社会生活突然断裂，在我们这一代又重新接续，我们从书本上学习生活，以致有一种不健康的做法，而现实对于这一批中学生，却只有失学和失业。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的磨砺，我们彻底甩脱了那种“屠格涅夫意味”的感情特征。

我想，所谓“老三届”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严酷的经历使我们惯于把生活撕碎了看，另一方面又始终有一缕浪漫的情愫模糊地萦绕在终极，促使我们不断的自我认定。戎在1975年底写给我的信反映了我们在“文革”后期的心境。现实的，物质的生活似乎是无望的，然而仍旧有某种渺茫而顽强的信心和希望，“人，除了那些爱情的，诗意的，伤感的个人之外，仍然需要是一个民族的，时代的，社会的，信念的人，人应当是这两者的总体，缺乏任何一方面，都使自己得不到全面的满足，这就是我设想着，给自己未来臆造的肖像。既不陷于狂妄的理想主义，也用不着将小市民的泥巴抹到自己的脸上。一个平凡的人，然而正直的，有用的人，就像雷维克那样。”

雷马克是《凯旋门》中的主人公，是一个情感深沉，性格坚强的外科医生。在开始恋爱的时候，我和戎都非常喜欢雷马克的小说，前途渺茫，生死无定，“文革”的背景与战争相似，在这样一个阴郁的背景之下，男人和女人的痛切而忧郁的爱。这些关于精神的漂泊与人格的坚毅的故事极易令我们感动，1970年我曾拜访诗人郭路生，我喜欢他在那首迷朦而清新的《烟》中所表达的境界，那时他还是一个肤色苍白的英俊少年，他曾断言说《凯旋门》是描写知识分子的最好的书，这不一定对；1980年我再见到他时，他已是一个被激情摧毁的人。

1972年我离开插队的地方去大港油田，戎仍留在白洋淀；我们已各自有了男友，来往渐疏。虽然令人遗憾，但也是必然的趋势，我们彼此的个性都很强，没有一个特殊的背景，难以长久交往。在我收到她1975年底的这封信后，我与戎又有过一段友好而短暂的来往；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以后，她和我都上了大学，毕业后戎去了美国，至今未通音信。时过境迁，我想我们都没有再见面的冲动；我当然不会忘记戎这位朋友，有关我的少女乃至青年时代的种种记忆，是与她的名字连在一起的。

二

“文革”是乱世，动乱造成了空隙，在这些窄缝一般的空隙中，形成一些自由的小社会，当时俗称为“圈子”，不同的圈子相交叠，于是，莫名其妙地认识了许多人。这与我们以往的生长环境是大不相同的。在中国，有单位，有组织，有集体，但是没有“社会”，虽

然我们叫“社会主义”。几个圈子走过来，熟识了半个北京城；如今，经过二十多年的世事沧桑，仍旧可以感到当年的“社交界”无形的延续。

1967年年初，我和戎常常骑车到海淀区的大学和附中；二十多年前，从白石桥到清华大学是一条幽静的林荫路。一天晚上，到北大附中找一个朋友，误闯入阎的宿舍，道歉后正要离开，阎却潇洒地说：可以从不认识到认识嘛。阎高高的个子，嗓音浑厚，据说是那首著名的《造反歌》的词作者。那天我们聊到很晚。以后断断续续地通信往来。

1968年，我们称之为逍遥的一年，看书刊号，郊游；在我们的周围，甚至在我们自己的家庭里，尽有悲哀的事情；而我们，凭着年轻人本能的自私和快乐，聚在一起饮酒赋诗，自以为是地议论天下事。那年秋天，阎的父母都进了“牛棚”，他的中关园的家正好是一个没人管束的自由的小天地；阎约我和戎到他家小聚，要请我们吃一席别开生面的“猫宴”，并注明饮料自备。

那时，中关园的周围是乡村野郊，尽是家猫野猫，货源充足；阎在院子里放了一个自制的捕猫器，每天设“猫席”宴请朋友。我们带了通化红葡萄酒和一瓶青梅酒，仍觉得有些寒酸，但已经没有更多的钱，于是戎绘声绘色地编造了一个如何与人撞车，摔碎了一瓶金奖白兰地的谎言。

阎做的红烧猫肉色香味美。他像大多数干部子弟一样，自命不凡，热衷于政治，说起当时的领袖，一口一个泽东、伯达。“文革”中个人权力的急剧膨胀和权利的被践踏从正反两个方面刺激青年人的激情与野心。由于有一个无所不在的最高权力导演着这幕悲喜剧，那个年代的任何真诚的，或自以为是的愿望与行为都只不过是牵线木偶的表演，在本质上与真正的自由意志无关。但是当年行为类似演习，很多人的人生观和志趣由此形成。

1967年底，他与北大物理系的何维凌（少丁）、王彦成立“共产青年学社”，由于他们的文词华丽的宣言有反林彪的倾向而被宣布为反动组织，何维凌为此住秦城监狱两年。

1969年初，阎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半年后，作为云南几万知青的代表，赴京观礼，并觐见伟大领袖。如上文述，那时我和戎的思想已有了很大的改变，并不以此为然；记得是戎写了一揶揄的信，阎于1969年12月写给我们的信可能是对戎的回答。这封信随意而形象地为我们保留了当年的思想及生活风貌；信中既有认真的求索，也有天真的自大；就当时而言，阎的思想并非正统，但可以看出他的人生观的入世倾向；我想他后来去美国，拿来绿卡，是沿着同一思路。

三

我发表于《北京文学》的短篇小说《山》（1984年3月），曾以何维凌为原型，那时他还活着。至今想到他已不在人世，总有不真实的感觉。

何维凌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个具有天赋才华的人，如果他生在良好的、适宜的人文环境里，他可能会是卓有成就的学者。在那个短篇中，我写了一个有激情、有才华的青年，他的激情具有某种原始的粗糙与天真的性质，而最终为媚俗的野心所腐蚀。那篇小说并不成功，以短篇的篇幅容纳中篇的内容，结果草草了事。我没有拿来给他看。不过我想即使他看了，也不至于生气，只要有所功成名就，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

1969年的12月，我与戎回到北京。像候鸟一样，冬天我们总是回北京过，白洋淀的冬天能把心冻得像冰一样硬。那几年，当局视我们这些知青如洪水猛兽，派出所和居委会经常在深夜以查户口为名驱赶返城知青，有时，不得已在衣柜中藏身。为了不给父母惹麻烦，我们带着一些衣物和书籍住进北大的学生宿舍。

当时，大部分的大学生已分配工作离校，留下来的只有低年级的学生，或是些有“问题”的人。何维凌、胡定国刚从秦城监狱出来，王彦已离开劳改队。宿舍楼里有很多空房间，我们冒充生物系的女生；毕竟是生面孔，每次进楼，总要受到盘询，大概就是在那会儿练就了面不改色地撒谎。

是阎介绍我们认识了他的三个“共产青年”的伙伴，阎神秘兮兮地吹嘘他的一个朋友如何是个天才；当我和戎第一次见到何维凌时，不免有些失望，这位“天才”有一张上海人的没有棱角，却有些滑稽相的脸，而那时的我们以为天才应该像罗丹的“思想者”一样，有着智慧的额头和深刻的皱纹。不过只要听他侃侃而谈，你会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他的渊博的学识和独到的见解（与同时的我们相比）令我们肃然起敬。以后他没有沿着这条路继续走，学问成为他若干年后从政和经商的点缀。

插队意味着失学，这是令我最为痛苦的事情，也是引起我青年时代那种茫然的仇恨的原因。那时我以为再也没有上大学的机会了，这反而促使我更加贪婪地读书。我懵懵懂懂地读了一点哲学，戎想学高等数学；既然住在北京大学的学生宿舍里，周围又有几个学理工的“修正主义的苗子”，为什么不学呢；我们请维凌当老师，为我们讲授微积分，并要求他“把数学与哲学联系起来”。

何维凌讲课如同他的谈话一样，条理清晰，引人入胜；而我们也是认真刻苦的学生，晚上做习题一直到深夜；我记得我曾在笔记本记下“零是纯质”之类的话，被王彦嘲笑为“何维凌语录”。我们在十天的时间里囫圇吞枣地学完了微积分，至今已印象全无。空闲的时间，去未名湖畔散步，听维凌侃尼采的《扎拉查斯特如是说》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人在年轻的时候易于接受一些浪漫、肤浅的东西，喜欢作非此即彼的判断；我厌恶妥氏的受虐狂的倾向，认为尼采只有自卑心理，而无公正原则；我不能理解，当思想和情感深入到极致，反而会呈模糊状态。那时维凌显然比我们成熟。有时也会激烈地争论，虽然我们是中学生，但已可以用黄皮书中更为现代的信息在辩论中抗衡。

那一时期生活是振奋的，白天读书，作笔记，自己为自己强行安排课程；中午到学生食堂打饭，也会引起莫名的、快乐而辛酸的震颤——对于已经在农村用柴锅烧饭的我们，这就像一个刚刚逝去的梦。

1978年，将近30岁，我考上了大学，发现我已不适于作学生，不愿意聆听教导，也不愿意住拥挤的集体宿舍。年华与经历错位。我真正的大学生活只有那短短的40天，1969年冬天在北京大学的40天，空旷寂静的校园，残破的标语——潮水过后的荒凉的海滩，短暂的空白，这是那些年我惟一的求学机会。

我并没有如阎那样，认为维凌是个天才，但就当时的水准而言他称得上通才。他的古诗写得典雅流畅，戎曾与他论诗作答。我认为戎崇拜他，可并不爱他。他的外表或许妨碍了内心的欲求，他青年时代的情感生活始终是不运气的。后来关系逐渐疏远，并不是由于这个原因。

我们始终没有加入他的小圈子，因为在本质上我们不是一类人。那时他的“反革命”的帽子还没有摘掉，却已决心在未来参与政治，改造社会；他必须处于社会的中心，而我宁愿站在社会的边缘。那时，尽管对他是敬佩的，但已本能地不喜欢他的小圈子中那种毫无保留，不分彼此，没有个人隐私的人际关系。

我已不记得那篇“共产青年学社”的宣言究竟写了些什么，住在北大的那些天，他们的共产主义的生活原则颇令我们既新奇又疑惑，看来牢狱之灾并没有改变他们的信仰。作为待分配的学生，学校发给为数不多的生活费，加之每人从各自的家庭得到的钱，不分多少，统一按需分配，那时王彦已有了女朋友，一个名字叫琪的有几分姿色的上海姑娘，后来成为他的第一任妻子，也与他们共同生活，他们的钱似乎就由琪总管。

当时王与琪还没有结婚，最初我们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是在公开同居，戎偶然发现这件事，惊讶得立刻跑来告诉我。我们是一直在被戏称为“修道院”的女校氛围中长大的，从未如此直观地面对性的问题，总以为这是粗鄙的。

他们的这种“共产”的生活方式令我们困惑不解，我本能地认为这是不自然的，我与戎从来没有为钱发生过龃龉，但我们实行对等原则，并喜欢来去分明。我想，他们这样做，是在试图使日常生活崇高化；22年前流行的观念与今天有很大的不同，加之年轻时的幼稚，使我们没有足够的批判能力；最初，我以为他们是高尚的，而我们是俗气的；但很快地，我们觉察到这种崇高的虚妄。

问题出在琪。女人看女人，真是敏锐刻薄。一开始我们怎么也搞不明白，三位有理想、有追求的名牌大学的高材生，竟会与一个来自上海棚户区的俗里俗气的小女人搅在一起。尽管琪给人的第一印象温柔而明理，在同性看来，她的俗气也是一望而知的；王彦爱上她的时候，必定以为她是个身世坎坷、一无所有的灰姑娘；初恋的青年，往往把幻象与实在搅在一起，加上欲望所燃起的激情，不可能看清对象；而这位灰姑娘却以小市民的精明，一点点地把王彦这个热情而慷慨的北方汉子的钱抓到手。

何维凌的小圈子的共产主义式的生活，对她这个身无分文的人来说是太适合不过了。直到他们离校，有了各自的工作，天涯各方，而王与琪已结婚，何、胡二人仍旧依照均等原则给琪钱；琪没有像我与戎那样去插队，她出身贫寒，也许正因为如此，她绝不肯再堕落入另一种辛劳的生活；她心安理得地寄生于三个热血青年的既天真又做作的高尚原则上，如同健康肌体上的癌瘤。

这样的情势大约持续了一两年。在北京再见到琪时，她得意洋洋地向我炫耀手腕上银光闪闪的上海全钢表，这是她积攒下何、胡寄给她的钱买的；共产青年向往崇高的精神，化为一个庸俗女人的虚荣的战利品。

这件事情具有讽刺的、象征的意味，它形象地表达了实践非理性的乌托邦的现实结果，一个必然是滑稽的，或者可悲的结果。乌托邦是无法实践的。对于二十年前的一个青年人，“文革”即发轫于一个虚妄的理想，最终留给我们的，多为沉重的教训。

以后的两年，我们断断续续地见过面。1970年，我一个人在白洋淀，生活艰苦，精神寂寞，便给何维凌写了一封信，其时他在江西干校劳动。这是我保留至今的惟一的一封维凌的信，他把我的姓拼错了，以致有很长时间王彦叫我“小偏”。多亏这封信，再现了青春

年代的热情与真诚的状态，否则我真忘记了何维凌曾经是怎样的一个人，忘记了我们之间还有过一段坦诚而亲切的友谊。

在热情的激荡下，即使是野心也显得崇高。他在信中谈到友谊、信仰，谈到他成长的过程，有一种坦诚的真实。现实的无可指望的窘迫，反而使生活洋溢着精神的光辉。而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境况的改变，或淡忘，或崩溃；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变化。对于何维凌，只有百折不挠的信心和意志才是他的本色。

1973年以后，我们完全断了联系。十年以后我再见到何维凌，他已是一个身材发胖、志得意满的中年男子。住在有地位的岳母家，在当时的政坛上攫取了某种接近权力中心的位置。关于他的婚姻，有过一些有趣的传闻，据说何维凌曾有一位写诗的女友，这位女友认识他后来的岳母；她把在当时传抄的诗拿给那位有教养的、阅尽沧桑的老妇人看，老妇人拣出几首维凌的诗，说，只有这个人的诗好，你带他来见我。于是他就成为她的女婿。至于说到爱情，他的婚姻显然是不成功的，不得不以离异告终。

1983年，他在二十二楼他岳母的宽敞的客厅请我吃饭，他告诉我，由于言辞不慎，在政治上又狠狠地跌了一跤；不过他并没有灰心，他从来没有灰心过。他以为虽然是“栽”，但是栽得有“层次”。我试图与他谈谈过去我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我明显地感到他的停滞；我不知道是由于个人才能的局限，还是因为另有追求所致。官运不佳，他出国作访问学者。积攒了一些钱和关系，又回国经商。

我搞不清他究竟做的什么国际生意，在我的熟人中，他算得上富翁，不过远不如他贫穷时的慷慨大方。他不安于本分，总要涉足政局，以致又出过一些事，他的在“文革”中刺激起的欲望和抱负似乎永远难以平复；“经几番风霜雪雨，却无缘高皇帝阶前。”这是王彦对他不无揶揄的惋惜。

离婚之后，他喜欢上他岳母家的安徽小保姆，一个身材性感，肤色黝黑，有着非洲人脸相的18岁的姑娘。朋友之中颇有微词，对此维凌挑战式地解释说：“我就是要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我就是要彻底打世俗的等级。”但我不以为这是一个灰姑娘和白马王子的故事，这其中没有美感可言；其背景是情感的不幸与人性的悲哀。

他的统治欲望和性格中暴虐倾向使他在情感生活中屡遭失败，以至他最终找了一个完全不可能与他对抗的人。他把她打扮得珠光宝气，试图以此提高她的层次，她为了讨他喜欢，也总是浓妆艳抹，在高级饭店的电梯上被误认为“鸡”。

1991年他与她正式结婚，并带她出国，谈生意兼作新婚旅游，因车祸双双堕入墨西哥的深谷中。

他动荡不羁的灵魂是否得到安息？

写于1994年

◇ 附录：“文革”中的四封信

▲ 附件一：

潘：

让我们双手紧紧相握，无论在什么时候，都绝不背叛，绝不离弃。

为了你的心情和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我给你留下这封信，真心地希望它能给你带来几分欣悦，几分力量。

我们——红卫兵，是在人民苦难的大动乱中觉醒的，是在信仰的旗帜——光辉的5.16通知下聚集起来的。如果谁因为个人的遭遇，冷淡了人民，丢掉了信仰，她就会被永远唾弃；无论她个人是在深重的苦难中，或是处于权力的地位。

只要你在战斗，纵使你遭到命运最残酷的打击，纵使你得到最难堪的失败，纵使你失去了一切，但是，同志的友谊的手永远不会失去。

我们了解时代的责任，我们对时代的心脏，时代的脉搏，时代的灵魂，有着高于同一辈人的更敏锐、强烈的内心感受，我深信，我们所激动，所致力于奋斗的，正是广大人民的希望和需要，这，就决定了我们是能被历史录用的人。

在人生的路途中，我们一起走了很远很远，但是，前面的路肯定更加壮丽（未必不是悲壮），伟大。用安慰来平息痛苦，是庸人的做法，我们要用希望来充填思想上的空白，用战斗来把自己振作起来。在苦难中，人成熟得更快。

在今后的事业中，我相信，我们永远是男子汉大丈夫式的朋友，这不是用禁欲主义约束而成的，而是共同的战斗，超乎女生的精神和伟大的理想。

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路已选定，为了一个神圣的目的，通过不断的社会革命，达到共产主义，再没有别的了。

“一起为了别的目的
而牺牲的人们
都是疯子。”（裴多菲）

戎 6.8.12.31

▲ 附件二：

潘：

你好！分别一年有余，常常不知不觉地想到你，偶或梦中依稀闪过你熟悉的身影，你近来一切怎样？身体好吗？为什么今年暑假没能来找我们呢？

我现在一切如旧，扔在闭门等着“福从天降”，但我从不是幸运的人，不过只多捱几天闲散的日子罢了。小妹现在也走了，到昆明去玩儿，所以，家中更加清静，无聊。

几次提笔想给你写信，但总认为，暑假即可见，因此也就作罢。后听吴丹说，你回来数日，匆匆又走了；我们俩人，原先到处找你，幻想顿作泡沫，所以，更急于要给你写封信，希望你新年回来，能够在京相聚，畅叙别后之情。真的，每逢我回忆起过去的生活，常常想起咱们这些亲密的伙伴，那时，虽相隔百里、千里，但却想念异常，来往甚密；至今不过两

年余，大家都同回到了一地，却又那么疏远、淡漠，老死不相往来。想不通这是为什么，但却感慨非常，可能年岁大了，热情过去了，有几个人还能常存“赤子之心”呢？对吧？

生活，这条浑浊的河流，带着我们，走了很远，我有时想到，我们各自经历了不少，经历带给我们什么呢？是对过去的基本肯定呢，还是背弃？我认为，我自己有些最原始的思想，虽然几经生活尘埃的扑扫，堆积，然而始终在顽强地闪烁着，而现在，这种目标的明确，用情的专一，是我自己虽然再三用怀疑论来验证，都决无否定之余地的了。我成为一个比过去更成熟，更自信，更明晰，更顽强的人，生活目标是非常明确了。

我想，人，除了那些爱情的，诗意的伤感的个人之外，仍然需要是一个民族的，时代的，社会的，信念的人，人应当是这两者的总体，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使自己得不到全面的满足；这就是我设想着，给自己未来臆造的肖像。既不陷于狂妄的理想主义，也用不着用小市民的泥巴抹到自己的脸上。一个平凡的，然而正直的，有用的人，就像雷维克那样。人，不用妄想自己是圣人，但也用不着丑化自己，硬认为自己是卑鄙、自私和委琐的，人不像动物，他有上进的决心，而这种努力会使自己保持高尚的思想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渴望你回来，好好谈谈。真的，现在能谈的人不少，但像你我这种“总角”之交的，却很少了。知道你很懒，不奢望你的回信，但愿你能来找我！

祝你一切都好！

戎

7 5 . 1 2 . 1 3

▲ 附件三：

潘、戎：

你们好！

29日的新收到了，甚为高兴，今天想详细地回答你们的问题。

戎来信不怕麻烦引用孟子著名训诫来“开导”我，很感动，“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此言是也！不过不要以为天会降大任于我，看来我还远不配作上帝的宠子，所以根本谈不上“少年得志”，也无从“踌躇满志”了。戎所谈的“临危不惧的共产主义精神”叫我摸不着头脑，一定是搞错了，或是某些闲来无事的人（好事者）的谣言。

来云南并非上上策——虽然也不是无可奈何——但是我们无产者所具有的马列主义斗争哲学，奋斗精神，对社会的认识，适应能力，以及为达到理想而焕发出来的毅力使我在许多方面高于他人之上（至少在我及许多人看来是这样）。如果你们能目睹我半年来丰富多彩又极其清苦的生活，你们就会懂得我代表云南几万北京知青回京观礼不是什么令人惊奇的了。

到云南以来，我所接触的北京学生（一千多）和以往在北京我们那个小圈子里接触的人大不相同，比较起来，我们是最高尚，最纯粹，最有理想，最懂得社会，最温文尔雅，最有前途和最厉害的。现在真地把我抛到一个新天地里来了，我周围有两个最忠于我的好朋友，但仅仅是朋友，一个身强力壮，忠厚老实；另一个精明强干，聪明，善良，他们两个都把我

的成就看成是他们自己的成就，在各方面尽全力支持我，我从中得到极大的鼓励，支持和温暖。

我对他们说，社会就是一个大战场（大概是巴尔扎克的语言），上战场就要战斗，不允许有任何的犹豫或畏缩不前。当然，我们也有上、中、下三策，朝最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其他人可大致分为四种，一，如李、齐之流，志大才疏，不了解社会，仅仅追求他们心目中的自我高尚。二，正统派，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修养派。三，生活派，不言而喻。四，野兽派。近几个月来我接触他们反而倒多了一些。接触的结果与我们过去对他们的印象有许多不同。从总的来说，他们虽代表最没落势力，但其中许多人，尤其一些大痞子，很有点头脑，很了解社会，尤其明白人们的心理。这些人有些很可爱，他们的“堕落”往往是由于不愿随从世俗而坚持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认识而造成的。有一些甚至可以大有作为。他们对我这个“正牌干部子弟”代表很客气，我的一些话比他们之中“伤”最大的人的话还受到尊重。我准备帮几个人改邪归正。

像我，像你们，像白洋淀那些人在这极少。附带说一句，有一个我们场原农大附中的准备落户在大田庄（他“婆子”据说在那儿，是个国民党少将的千金），请告诉我，在大田庄的都是些什么人。

在给你们写信的当儿收到保嘉的信，从信中看她还是那么潇洒，但保嘉的文字与她这个人是不大相似的。保嘉又问我：主动或被追失去什么“过去我们认为可贵的一些”东西，对这个尖锐、挑衅的问题我真茫然了。我想我大概不会问这样的问题，这简直是对我人格的侮辱；好在她未必是恶意，她不了解我，小孩子嘛，可以原谅。我觉得过去的许多东西都为我肯定，没有什么可反悔的。而要把我的主张“强加于人”或付诸于世则必须努力奋斗，事实上我昨天的话还是廉价的，而今天则有了几分力量，明天呢？

现在我的思想很落后，试想，一个人闭门造车能有什么发展？分析起来我们过去想的太离奇了，离实际生活太远，要在社会和生活实践中锤炼和考验它。但是我很喜欢新思潮，年轻人思潮鼎沸，只要掌握住中心和方向就大有裨益。我不赞成那种“各种互相矛盾的倾向”，这岂不是胡来了么？我看的书，接触的人都远不及你们，望以后介绍些我们过去谈的那些，本人感激不尽。

颐和园的傍晚当然令人难忘，作为旁观者的你们尚且如此感慨，当事者的我就可想而知了。像这样情（豪情）景（状景）紧密交融的动人场面我经历过好几次了，但平时很少想起它，只有在又临壮丽风光时才把那悲壮的几幕油然勾起，我想起了过去，想起了少年，真像昨天一样！

我决不是三年以前的阎了，甚至不是半年以前那个大傻孩子，我已感到自己真正成长了，有点大丈夫的自豪感，祖国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年轻人无所作为，多愁善感的气质仿佛是遥远的过去。我们这儿山川的风光大概是全国最秀丽的，我很欣赏，但感情上却少像过去那样奔放，几个月来只有觐见主席是最为激动。

我不准备长期在这儿呆下去，虽然我现在这么“红”。出路有两条，一，走后门当兵，二，走后门去军事院校或其他院校。

现在和少丁保持一般的同志联系。

好，还要给别人写信，不知这样是否可以看到我的思想。

致
无产阶级革命同志的敬礼！

阎

6 9 . 1 2 . 1 3

▲ 附件四：

Pian:

（你的文笔很不错，可见“后生可畏”！）

很高兴，收到你的信。上次琪来信，讲到戎在京，偏偏没有提起你。我写信问了，回答是你未得脱身，置身于同志朋友之外，确实会有孤独之感的。“多情自古伤别离”，这是常事，但不能过甚的。自从我离开北京，离开同志们有二个月了，时间虽短，可是思绪千端。我常常揣摩“友谊”这两个字，革命者的友谊和同志不可分离，又与理性、信念紧紧相系。我想，我们在世上几乎失去了一切，残酷的现实剥夺了我们的一切，唯有友谊是永远属于我们的。过去我也只尝到友谊的滋味，而唯有别离才能真正体验它。人生往往是这样的，“过去的一切，又变成美好的回忆。”当我在嘈杂空旷的人群中凝思往昔时，友谊更成了回味无穷的珍品了。我作了许多比较，历代的英雄豪杰也罢，骚人墨客也罢，都赞叹过友谊，但惟有我们时代的共产主义者的友谊最珍贵，也最纯洁。

我们不是为往日的峥嵘岁月唱挽歌的，要为绚丽的未来奏序曲。记得去年，我们初次见面时以至一直到今年四月我们挥别后，你们都给我留下极好的印象。我觉得你们有生气，肯努力，思想开放，行动果敢，这一切，往往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几乎多少都具有的，但之所以为我感动，只是这样的品格保持在这个时期，运动后期，我看到更多的青年是颓丧，放荡，或者是平庸碌碌，或者是投机钻营；真正敢于立足于理想，坚定信念，百折不挠，积极进取是还是少数。虽则少，但缺少精华，是未来的希望。我想，在大动乱时期，什么宝货都会炫耀一番，这不足为怪，这里往往是鱼龙混杂；然而，惟有在平静之中，在令人窒息的平静之中，决不动摇，以自己默默无闻的思想和行为向社会挑战的，才是真正的人。

这回我看到你的信，一方面我觉得很高兴，我觉得我们的友谊在增长，我衷心的希望它能永葆光彩。你知道，我过去接触过不少有才华、有抱负的青年，可是永远走下去的少，半途而废的多，多数人成了我们理想的悖逆，或者是匆匆过客；思想起这些，有时会感叹，更多是愤然；我想，我们应该是永久的同志或朋友，我们应该开拓崭新的关系，为前人所向往，为来者所仰慕的真正的的人的关系。另一方面，读了你写的信，总有些闷，一种难以名状的闷气，好多人都有闷气，惆怅之感，闲有闲的苦，忙有忙的愁，看来，这是有为青年常有的“感冒”吧。

有时，我想和你们多谈谈，可是没有机会。没有条件，也没有气氛。我们大家都很有自信，都不愿别人“教训”的，说实在的，我并没有教训别人的意思，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你们还年轻，没有经受过痛苦的磨练，也就是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冲突中的考验，青年人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会发生几次精神危机的，有人就此崩溃了，有人因此淡漠了，也有人从此更加振奋。

写在这儿，我想起自己的过去，我是怎样过来的呢？这些我没法写得很多，现在我的时间紧极了，除了睡觉吃饭之外没有自由支配的暇余，写信就得靠挤，这可能和你大不一样。随便说点儿罢。

我小时候什么也不懂，成天调皮捣蛋，直到十四五岁，那时我才好像在大梦中惊醒。那时有人给我提出了第一个严峻的问题：什么是人生，人生应怎样度过？我在朦胧中感到要做一个真正的人，那时我才领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也体验到奋斗、探求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小时候我虽然很幼稚，却很羡慕游侠豪杰的生活，喜欢打抱不平，可能小孩子大多是这样的，心地善良，很同情一些痛苦的事，每听到或看到一些伤感的事，即使是故事，都很心焦，忐忑不安。

自从我开始体验人生那时候起，我就很自然地受共产主义美好未来的熏陶，不管是诗人的幻想还是哲人的展望，我向往那样的社会，我愿为它奋斗终生。当我把自己的一切行动都和开拓自己所想象的美好社会相联系起来时，感到喜悦，愉快，如醉如痴。那个时候正是建设呼声大振之期，因此，向科学进军，探索物质的奥妙成了我的具体奋斗目标。我是怎么从整天吊儿郎当一下子变成废寝忘食的，回想起来简直像读小说一般！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光阴如电，可我从来没有背弃自己的信念，我已经定型了。

在这十年中，我也有过好几次的精神危机，从抽象的理想到具体的理想，从辩护现实到向现实宣战，从奋发科学到立志革命。总之，从必然走向自由。经历了许多波折，有成功的喜悦也有挫折的苦闷，性格变化也极大，过去我对谁都同情，热情，像一团火，而今我除了对同志、朋友还保持这个特点，除此之外我几乎变得很冷酷，像一柄剑。但在任何时候我都信心十足，都有决胜的信念。我想，我之所以能百折不挠，其关键在于坚信理想，坚信我对它的科学分析，从人的本质出发而预定其必然实现的信心；此外，以自己的火点燃旁人的火，以心发现心，我有同志，有朋友，在我足迹所到之处并没有留下悔恨的痕迹也在。

我总结自己的教训，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过分相信别人，以善良的愿望揣测别人的叵测之心，也在于过分理想化地看待斗争；但这些都并没有什么，我懂了精神力量对于人来讲是无穷的，没有建立支柱就没有确定不移的行动；有人以为这些都是幻想之属，但我完全不这么看，捷尔任斯基说得好，要有幻想。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美好的幻想变为科学的理想，从而化为生动的现实。

我想，当你苦闷时，应该多想想同志，朋友，应该去冷静的分析一下自己的信念是否合乎真理，只要是这样的，那就坚定地走下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应该为欢乐而生活，要永远欢乐。自从我们相识后，我对你总的印象是感到你的愁苦并不多，原来也有这么一大堆呀，真有意思！

我觉得人生活在社会中和别人往来也有点像粒子碰撞，偶然性很大，当然也有必然性，这就造成物以类聚。不必说我们认识是通过多么巧合的途径，就是我和彦等人以及彦与琪的相识都是多么有趣的碰巧，人生，真有意思！

你讲到你很厌烦你那里的处境，其实和我比起来应该说是天上、地下的，我多么希望每天哪怕就有两小时的自由支配时间，有多少事情要做啊！现在感到，才华就像成熟透了的蜜果一样，稍一碰触就会洋溢纵横，可是就缺少条件，一点点也没有！那也没什么！过去我也愤忿过，其实是多余的；须知，条件应自己去创；我们的斗争从来不是孤立的，更不是为了个人，这点保证了我们必然胜利。

说实在的，我不十分知道你所想象的未来是什么，你所想象的前途具体如何，对你的过去我知道的太少，比如，我对其他一些人了解得很多，有些几乎是了如指掌的，我很希望你能不厌其烦地多写些这方面的东西，我们之间能作到这样么：无所不谈？可能会有些困难，记得戎有一次说过你们之间什么都讲，难道没有个人自己的保留的东西吗？她说，如果真是这样，就受不了的。确实，可能是那样的。关键在于建立起什么关系，其深度如何，当然这里还有自尊心的问题；但依我看来，同志之间只有同志的自尊心，你知道我们过去也有许许多多的争吵，但终于在争吵中建立起新时代新人的新关系，可能你略有体验。但不见得切实体验，那样的心境将有无穷的力量和无限的欢乐，尽管有人以为我们一直够苦的，可是一接触就发现我们都是那么乐天，很难理解。然而，其奥妙就在这里。你过去接触许多人，形形色色各种人都有，你试过分析比较了吗？请你下封信跟我说说自己的想法。

要说的东西很多，所以中心议题都没有，下笔千言却毫无头绪，就这样吧，时间太紧，没办法！

就我主观臆测，你写给我这封信，大概是因为有点空虚的缘故，假如你生活又丰富起来了，可能就懒得动笔了。一般人都是这样的。我就这样不揣冒昧地猜疑了，可别见怪，如若不是这样，请常来信。

说到我这儿的生活，简单概括几个字就是：劳累，省心；我处境很好，除了最遗憾的是时间太紧之外，作为平静地观察，整体来讲是不错的。最使人高兴的是我终于能够借此机会弥补自己过去的不足：劳动能力弱。我到这儿来就是专拣重活干，拼命干，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是为了“增益其所不能”。现在我在这方面大有长进，体力强多了，算是个劳动力了。但我还要努力。这封信就暂时不谈这儿的的生活了，以后慢慢聊吧。我想，到再见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变成个“黑人”了。有趣！

为了侧面反映一下这儿的的生活和我的心情，我抄几首小诗给你，上回寄给彦、琪过。

浣溪沙（三首）

远目长堤挂幕帆，
霖来溽去絮云蓝，
雄风快哉爽襟衫！

惊梦飞魂挥剑笔，
“忘机”着意舞锄镰，
闲眺玉斗转中天。

信把鄱湖比贝湖，
烟重水漫失冥庐，
长歌“变征”愤难除。

大块蒸云风柱举，
星河滚浪月帆浮，
何时上路问征夫？

穗浪风推染稻香，
新瓜带叶沁淋凉，

搭巾斜笠浑“阿乡”。

笑指沧桑堪煮酒，
听雷坦荡志一匡，
问言梅子几时尝？

这里我用了不少典故，不一一说明了（贝湖即贝加尔湖。）就此搁笔。

（1）我在这里可能还得呆上一段时日，故尽管来信，处境不错，书信问题不大，当然别过分即可。

（2）我的那个“凌”字不少“龄”字，小家伙，别搞错了。地址如前。

少丁

7 0 . 7 . 2 1

〔作者简介：潘婧，女，原名潘青萍，又名乔伊，北京作家。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大女附中，次年赴河北白洋淀插队，为白洋淀知青诗群之一员。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

□ 原载《中国作家》1994年第6期

~~~~~

【青春有悔】

半透明之夜

• 杨 瑞 •

我若能在1966年倒头睡着在广州城里的大街上，第二年回到家中又何以夜夜失眠？这真有点儿不可思议，但事实如此。躺在床上，睡眠像是跟我捉迷藏。我只好和自己论理。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去年，红卫兵是毛主席的小闯将，领导着千军万马冲锋陷阵，每天都有干不完的事情，即使一天给我们48个小时，我们还是没时间睡觉。现在却镇日无所事事，这么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事物总是要走向它的反面”，毛主席的话一点不错。老革命变成走资派，老红卫兵为了保爹保娘开始反对文革，虽然不是每个干部子弟都这样，但也为数不少。这些人真做得出！好了，现在我们又恢复学生身分了，毛主席说“复课闹革命”，但复什么课呢？老师们全都学乖了：什么也不做的人永远不会犯错误，日后也不会有人找麻烦说他们与学生为敌。

敌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革命……1966年我的第二次串联是为革命还是为旅游？说实话，我登华山的初衷纯是为了游山玩水，可到了那儿却阴差阳错地又闹了场革命。都是那些老道士，不然我也不至于……他们自以为聪明，以红卫兵之道还治红卫兵之身，结果引火烧身，悔之晚矣。

他们让我在山顶上填的那张住宿表得回答他们多少问题？60个？也许还不止。我父母的阶级成分，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七大姑八大姨，他们的姓名年龄职业单位政治面貌，是否参加过反动组织，有无历史问题，有无海外关系……问得没完没了。去他的！无非在他们的寺庙里过一夜，要一个在寒冬腊月连炭火都不生的房间。他们给的被子又冷又潮，我整个晚上都在簌簌发抖，阴气深入骨髓。窗外，山风横起，松林咆哮，西北气流雷霆万钧般碾过峰峦。

我通宵目不交睫，咬牙切齿一遍遍咒骂那些老道士：你们以为自己是什么人？是为我立档案的干部，还是公安局的户籍警？胆大包天，竟敢以阶级斗争为名要我，一个红卫兵，来填写三代人的出身，这问题最让我没面子。哼！咱们走着瞧。山下华阴县中学有500名红卫兵，扫平这座道观人手足够了。把他们动员起来，半夜出发上山，到山顶10来公里，黎明时分给他一个突袭，搜查一下看能不能找到枪支弹药、电台或其它反革命罪证，否则也可以破除迷信。哈，这个主意不错。

三天后，计划如期执行，虽然没有找到枪支电台，仍然不失为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所有的道士，那些精神鸦片贩子和寄生虫，都由当地的红卫兵押解山下，扫地出门。那天晚上，我睡到了道长的大床上，暖和舒适，腥红色的丝缎被面，棉胎是新絮的。房间里，淡淡的檀香味仍在缭绕，古老的铜盆里，炭火熊熊。冰天雪地，春意融融，骑驾跨鹤飞越四海，山巅的青松，五彩的云霞，阴阳的和谐，甜美的梦境……

睡觉！睡觉！我一定得让自己睡着才行。5点半以前，别去想5点半！想想我全身的神经都紧张起来。放松，数数字，1、2、3……16，我今年16岁了。

我16岁生日是在贵州的遵义度过的，花了一分钱，买了一粒水果糖，自己庆祝了一下。那时我身边只剩一分钱了。11月间我和另外5名红卫兵一起离开北京，瞻仰了毛主席的故居就分手了。“东方红，太阳升……”别去想那首歌！它简直能让我发疯。我们一行人个个有自己的主意，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分道扬镳，说好回北京再见。

生日过后的第二天，天刚破晓我便起了床，自己一人大踏步走进遵义城。我打着绑腿，脚穿草鞋，头戴竹笠，时下步行串联又大行其道。我也想亲历一番，选定的路线是当年红军走过的长征路：娄山关。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在此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四渡赤水，殊死奋战。寡不敌众，饥寒交迫，几千名红军战士长眠沙场。他们的墓碑树在路两旁的山坡上，有些墓上刻了姓名，更多则写着“无名烈士墓”。

站在墓前，我仿佛听见每一位烈士在讲述一个英雄故事：子弹像蝗虫般飞过，河谷回荡着战斗的呐喊。日色昏黑，流水血红，痛苦和绝望深不见底，爱和梦驻留在青山翠谷之中。我被深深打动了，觉得自己的一切都是这些没有能够活着看到新中国的先驱们给的。我发誓要继承他们未竟的事业，让先驱者的热血在我体内流淌。为了牢记这誓言，我决定把名字改掉，从此不再叫瑞，不管是瑞士还是吉祥，这些意思全不合我心意。从今以后，我要叫红军！脱胎换骨，面貌一新。山河日月，请鉴我心。

红军，我第二次串联途中就一直用的这个名字，从云南边疆来的红卫兵也这么称呼我。我在路上与他们相遇，边走边谈，几个小时后我们已经彼此十分了解，成了好朋友。那时，我们脑子里不存在“隐私”这个概念，聊起来百无禁忌，有疑必问，有问必答，句句是肺腑之言。

我一路与之同行的15个云南红卫兵都是硅矿工人的孩子，家乡在个旧。带队的年轻人17岁，高挑英俊，其他队员有的简直就是孩子，最小一个女孩才13岁。

人小志不小，我的这些新朋友雄心勃勃地计划从云南一路走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先沿长征的路线到延安，然后取毛主席在解放战争中行军的道路进北京。好一个宏伟的计划：全程3000多公里，全凭双腿步行！

“不打紧，我们能走。每迈一步，就离毛主席近一分。今年如果走不到，明年也一定能走到！我们有决心！”

这番话是一个14岁的女孩带着浓郁的云南口音对我说的，她的发音绵软轻柔，所表达的信念却是谁也不会误解的。“我们每天走100里，一星期走7天，明年3月准能走到北京。”

好个主意！我暗想，没准我也可以试试。毕竟我比这里多数女孩都大，她们能行，我难道就不行？这可是一个对我毅力的考验。

在陡峭的山路上一天走100里决不是闹着玩的事。当天下午我就意识到自己有多么无能，真是一个典型的口头革命派。不论我如何紧赶慢赶，就是赶不上我这帮新朋友。他们抢过了我的背包（背包里装满了老三篇，我原打算一路上散发给农民看的，后来才发现有好多农民根本不识字），又抢过了我的铺盖卷儿，即便如此，我还是拖了他们的后腿。又走了一段路，我死活坚持让他们先走，不要再等我了。

天黑了下來，山峦化作大片的暗影。星星布满天空，没有月亮，脚下的路也沉到黑暗中去了，极目处看不见一座村落，听不见一声狗叫，还得走差不多10里才能到达今天的目的地。我几乎要哭出来了，不是因为怕鬼怕坏人，而是感到实在力不从心。“红军会哭吗？当然不会！红军流血不流泪。”

“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那个年代，无数的中国人遇到困难都会背诵这段语录给自己打气。话音刚落，奇迹出现了！我突然看到前方闪出一点灯光，开始时灯光在暗夜中飘忽不定，再走近一点，又亮了一点。最后我看到一盏马灯，映照3名云南红卫兵的笑脸，那个带队的小伙子也在其中。他们告诉我他们早就到了目的地，左等右等不见我的人影，天这么黑，他们决定返回来接我。

他们陪我一起走到村里的红卫兵接待站。女孩们已经为我准备好了一切：热水倒在木盆里，一只小板凳放在边上，她们坚持要先泡泡脚，说这是走长路的人应该做的第一件事。之后她们又给我在桌上摆好了饭菜和开水，连床单和枕头都帮我从接待站借来了。这时已近午夜，所有的女孩都走足100里，3个男孩为了找我，走了120里，他们也都精疲力尽，然而他们为了照顾我都还没睡。我感动万分。

此后的日子，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山路弯弯，数十万红卫兵向着北方日夜兼程，为圆一个共同的梦。在这漫漫征途上，人们萍水相逢，却真心地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一句“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便使大家情同手足，心贴着心。如今回首往事，明知自己也曾经沧海，这记忆却已恍若隔世，中国变了，我也变了。

第二天，我们又走了100里，我的脚打起了大大的水泡。咬紧牙关，我强忍剧痛朝前走。这次我不再坚持让云南红卫兵先走了，免得他们半道又得回头找我。我们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后才到达目的地。

第三天，我遇到了怪事。不管我怎么努力，就是起不了床。背毛主席语录也不起作用，两条腿像不是长在我身上一样。我难为情极了，不用说，云南的红卫兵不会把我扔下，于是我们在桐梓县住了下来，一住住了3天。我心里好着急，这次我真的把大家的行程都耽误了。

第四天，我对云南红卫兵说，我决定坐火车去重庆。我作出这个决定有一部分原因是我需要钱，虽然步行串联能在接待站得到免费的食宿，但身无分文终究是老大不便。只有到了大城市，我才能让父母给我汇钱。

我的新朋友送我到火车站，看他们站在车窗口，我颇为惭愧。但同时我也感到一种优越：北京的红卫兵事务繁忙，我不必像他们那样徒步大半个中国走到北京。我们毕竟有所不同。

开车之前，我给他们留了北京的地址和电话，相信第二年春天我准能在北京见到他们。但事与愿违，第二年开春，一个同学从延安回来，他说在延安遇到了一队云南的红卫兵，那时，红卫兵已不让串联了，步行也不让。云南的红卫兵被迫返回。而他们在离开前，曾托我的同学给我捎一顶竹笠。

“他们说那是你的帽子，再三嘱咐一定要捎给你。”

“帽子呢？”

“喔，那斗笠已经不成样儿了，旧得一塌糊涂。给雨一淋透，全发了黑，边上也有好些地方磨破了。我想你不会要它的，就把它扔在车站了。”

那是在桐梓县和他们分手时落下的帽子，这么说，云南红卫兵把这顶帽子一路带去了延安！他们完成了长征的壮举，走了差不多2000公里。无尽的山道，迈出的步子何止以百万计！雨雪风霜，日出日落，竹笠是这一切最好的见证。它又是我们友谊的象征。我把这段不寻常的历史讲给我的同学听，他立即失悔。可惜已经太迟了。我也心中难过，还不是为帽子，而是为我的朋友，我知道他们一心想走到北京见毛主席。这场梦竟无法实现。他们被送回家时，其伤心失望可想而知。

我们去年路遇时，那些云南红卫兵以为我见多识广。去年，一个从毛主席身边来的红卫兵那可是号人物。所有的人都对我们敬佩不已，不论是老干部还是青年学生。连我也以为自己见过大世面。但事实上，我究竟懂得些什么呢？现在我算是知道我很多事都闹不明白。第二次串联回来，我便感到如坠五里雾中。

文革伊始，红卫兵起来反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打倒走资派，破“四旧”。现在，红卫兵在斗红卫兵，四三派，四四派，联动派，三者必居其一。昨日的战友，今日的死敌，友爱化成了一腔深化大恨。

吴和我现在见面招呼都不打。“文革”前，我们是知心朋友，曾一道在东北义国的桃林里复习功课，其他女孩可不敢去那儿，因为那儿是一大片坟地。我们也曾漫步在荷塘畔，冒着蒙蒙细雨吟了诗来送给对方。“文革”刚开始时，我们还在一起讲家史，像阶级姐妹一样

相互挚爱。但后来，她参加了联动派，我加入了属于四三派的毛泽东主义公社。从此我们俩便势同水火，彼此的轻蔑与日俱增。

吴看不起我，这我心中有数。她认为我太天真幼稚，不了解上层的路线斗争：江青不光彩的历史啦，林彪的个人野心啦，周恩来的机会主义啦，等等，等等。他们关起门来谈论起这类话题总是一副津津乐道的样子。我想如果我附和进去，就不天真了。其实我岂能天真到看不出他们这些高干子女高谈阔论背后的动机么？这些人若唱什么解放全人类的高调，我半点都不信。当“文革”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时，他们马上就背叛革命，转而关心父母的官运。他们心目中哪里有人民的位置！他们想的就是如何保住特权。他们在乎中国的命运仅仅因为在这个国度里他们曾经是天之骄子。他们自私伪善，虽然如此他们仍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我简直受不了这帮人！

不管怎么说，吴和我再不喜欢对方，至多也就是白眼相向罢了，我们还没到恶语相加的地步。在其它地方，革命群众用棍棒和砖头对付革命群众，有些甚至动用步枪和机关枪。最近一零一中就有一个学生在江西被人用机枪打死，他和另外一些人在卡车上中了伏击，死的时候才16岁。

他属于我们这一派，我参加了他的葬礼，当时这派的许多红卫兵宣誓要去江西完成烈士未竟事业，我没吭声。真是可耻！不过我实在不想这样去送死。

哒——哒——哒——哒——哒——哒——哒——

在漆黑一片中，我的胸膛突然被一串子弹打得千疮百孔，周围的人在痛苦和混乱中尖叫。血流如注，像消防龙头喷出的水。我呼吸困难，强忍着不喊出声，但恐慌的人群把我踩在脚下，他们的皮靴揣开我的伤口，虽然我的心已停止跳动，我仍能感到剧痛。是谁杀了我？为什么要杀我？我永远也搞不清。

我是个懦夫吗？我将来会叛变吗？……在酷刑下会招供我的同志么？……谁是我的同志？谁又是我的敌人呢？……这些事一辈子都想不出个结果。风车一个劲地转呀转，堂吉珂德大战风车……像这种混沌状态我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几点钟了？唉，不！不能看钟。听也别听，滴答声会越来越响，我最恨这响声了。

深深吸一口气，就像准备潜入海底一样。定定神，水克火，火克金……火在我的心中间烧，夜复一夜……红烛滴泪……还是换一个姿势试试，两只手臂都放在枕头下，有时这挺管用的。

夜又开始泛白了，几乎是透明的。奇怪。过去我老觉得夜昏黑而浑浊，现在才知这是误解。透过薄薄的蓝色窗纱，微光流入我的房间。我像在海洋的深处，暖流寒流，漩涡暗礁，我的思路随波飘荡，了无定向。记忆沉浮，珍珠闪亮，鲨鱼游过投下一片阴影。

我的房间过去多么温馨怡人，现在却冷冷清清。虎子死了，似乎还能感到它卧在我被子上留下的那种温暖和分量。孩子们怎么能这么残忍？什么可爱的天使，祖国的花朵，这些小孩全是混帐王八蛋！我要能逮住他们，非把他们的牙打掉，把他们屁股踢歪。得用皮带狠抽他们，抽得他们求饶，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也好泄泄我心头的无名火。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恨这帮小混蛋，也恨我自己，我简直是废物，连一只猫的生命都救不了！

二姨也走了，我也留不住她。不知此时此刻她是醒着呢还是睡着呢，她呆在她的老房子里，那是她曾经和丈夫儿女一起生活过的地方，每一个角落都堆积着回忆。抽屉啦，衣橱啦，床底下，蚊帐边，像蛛网一样，粘住了瞌睡虫。在二姨的故事里，这些看不见的小虫飞到人的鼻子里，人们就睡着了……快睡吧！我的房间里也有蜘蛛网么？

我明天要去看看二姨，她见到我一定会高兴，她会跑上街买肉买菜，切呀切，炒呀炒，出锅的尽是我最爱吃的菜。“尝尝这个，尝尝那个，多吃点！”二姨脸笑开了花，眼角里却残留着许多寂寞。她不敢来探望我们，邻居兴许会打小报告，给我们造成麻烦。我应该多去看看她。

上次我去看她……我像是被蝎子蜇了一下。我没敢跟谁说起，一种偷了人家东西的感觉，其实那只箱子里每件东西都是我们家的，母亲的钻石婚戒，一只金手镯，父亲的德国照相机，几本珍藏的旧书和古典音乐唱片，一只新的瑞士手表，林林总总。箱子放在二姨那里是最安全不过的。没人抄家会抄到一个在旧社会贫困不堪的老太婆身上，二姨深受居委会的信任。她答应帮我们保管这只箱子，问题是怎么把箱子弄到她家去呢？

父亲和母亲朝我看看，一言不发，我心领神会：只有我去最合适。我真不爱做这种事，不过我还是做了。在街上，在公共汽车里，所有人都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和那只箱子。人民群众的眼睛雪亮而犀利，他们在我身上扎出了一个个洞，我则活像一只纸老虎。外表上看，我武装到了牙齿，一个杀气腾腾的红卫兵；但在内心深处，我且疑且惧，惶惶不可终日。

我知道自己做的事不地道。李叔叔的女儿就没这么多私心，她揭发她的父母，把什么都报告了她父亲单位的红卫兵，包括父母晚上说的话，他们藏东西的地方。

说她“大义灭亲”也罢，说她“落井下石”也罢，这一切都是她父亲多年来对她教育的结果。“你可以不相信任何人，但不能不相信党；不论发生什么事，对党一定要忠心耿耿；热爱毛主席要胜过爱你的亲生父母……”

李叔叔被“拉下马”之前是某学院的党委书记，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行家。我认为他的女儿背叛出卖了自己的家庭全是他的错，现在他和妻子对女儿恨得牙根痒痒的。他们应该以她为荣才对，我就很佩服她，这样的事我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我承认我是个伪君子。可是我宁愿做伪君子，也不愿做傻瓜。

毛主席和我的父母，我究竟更爱谁多一点？哈，这倒是个难题。老实说，我真觉得我爱毛主席胜于爱父母，要是毛主席、父亲、母亲和我坐在同一架飞机上，这架飞机马上就要坠毁，而机上只有一项降落伞，我会毫不犹豫地把它给毛主席，宁愿我和父母在烈焰中被炸得粉身碎骨。又比如我们在汪洋大海中航行，我们乘坐的船即将沉没，我会把唯一一件救生衣给毛主席穿上，我和父母当含笑葬身鲨鱼之腹。可这会儿，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中南海里安然无恙，我父母却危在旦夕，我当然得帮助他们啦。他们并没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事实上，他们的麻烦大半是因为他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力。文化大革命招来的。

直到去年父母还不见有什么宿敌，学生都喜欢他们，同事亦相安无事，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父母不与任何人争。遇到提级、分房和长工资等事，父亲的哲学是“激流勇退”，母亲虽则勉强，也只好听父亲的。因此，去年父亲的许多老战友被打成走资派，挨了斗之后，都说父亲棋高一着。



高？哼！“文革”开始时他们批判学院的领导这一着就高不到哪里去。他们这么做，顿时就给贴上造反派的标签，学院里有一半人与他们不共戴天。对这些人来说，将我们碎尸万段都不解恨。

为达目的，我父母的同事翻起了陈年老帐，还搬弄出许多新的是非。他们成立了专案组，到全国各地调查我的父母。至于他们当不当权，这无关宏旨，打不成走资派，至少可以戴顶“幕后黑手”的帽子，或是叛徒、外国特务、现行反革命等等，各种各样的帽子多着呢。

有一点值得庆幸，我父母没有历史问题。母亲在解放前是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父亲给派去了延安而不是回到北京去做地下工作。这实在帮了他的大忙——做地下工作难免会和党失去联系或被敌人逮捕，碰到这种情形，谁又说得清楚他有没有叛变，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只要有人对他的清白产生疑问，他的罪名就成立了。父亲许多老朋友的厄运就是这么来的。有些还给抓了起来，实行逼供信。

延安相比之下安全得多。很多人都认识父亲，他们可以证实父亲从未离开过解放区，也没有脱党，更没有被捕过。鸡蛋里怎么能挑出骨头来？且慢！若是采取逼供信，鸡蛋里什么东西挑不出来？子弹、匕首、机关枪、无线电台……你随便说好了。

延安又怎么样，安全在哪里？单是认识很多人这点就已经让父亲招架不住了。在延安时，叶剑英是他的上司，王光美是他的同事，又是他辅仁的同学，伍修权是他和母亲的结婚介绍人等等，这张名单可以开半天，即便父母在这些人当了大官儿之后再没与他们联系，专案组的人魔镜在手，定要找出他有历史问题的蛛丝马迹。

跟这些人说实话？专案组的有些人就会勃然大怒。他们拍桌子，跺地板，薄薄的门板挡不住从父亲房间传出来的声音。父亲态度和蔼忍让，审问他的人却声色俱厉：“我们警告你，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们的问题！要是想包庇叛徒和走资派，你决没有好下场！小心你的狗头！”嘭！嘭！

要父亲诬陷老同志，他所受的压力莫可言状，泰山相形显其轻。父亲何去何从？他态度坚决。

“我得讲实话，”他对我说，“不能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的猜测，不负责任的说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会置人于死地的，也会毁了别人的家庭。我不能这么做，我是共产党员，我必须对党负责。我知道坚持真理也许是要付出代价的，很惨重的代价，也许你也要受到牵连，瑞，你明白么？”

我明白，父亲，便是付代价，你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敬佩你的勇气和正直。但是别人也会像你一样讲真话么？你们学院的红卫兵对你的老战友施加压力时，他们会怎么办？只要他们说些似是而非的话或者干脆编造点什么来迎合这些人以求自己过关，我们便完了。千钧一发，一把利斧此刻正高悬在我们头上，每一刻都可能落下来。我好怕这一刻，日日夜夜提心吊胆。

红卫兵来了，为数甚众，嘭！嘭！嘭！响声惊醒了每一个人。“开门！”“快点儿！快点儿！”沉住气，越慌乱事情就变得越糟。门一开，人群蜂拥而入，皮带解了下来，绳子和手铐也都备齐了。搜捕令？没必要，有人坦白交待了，法律不再保护我们。抽屉拉出来了，箱子打开了，东西倒了一地，他们逮捕了父亲，他们逮捕了我，把我们押上囚车，在电影里

见过的那种，解放前国民党用来抓人的。“再见了，妈妈！再见了，我的同胞！不要哭，坚强些！黑暗就快过去……”

黑暗。我被黑暗完全笼罩住，地牢里伸手不见五指，只闻到血腥味儿。我的眼睛瞎了么？严刑拷打……实在是不堪忍受……我的血肉之躯……但是我必须坚持住，不能让同志们遭殃。

“我得讲实话，不能无中生有！”

“我不会告诉你们，我决不出卖同志！”

他们在父亲面前拷打我，他们拷打父亲……拷打我……父亲……我失去了知觉，两眼漆黑，从高山之巅跌下落入万丈深渊，像一片羽毛，飘忽而下。气流摆动。晕眩……睡……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毛泽东……”

噢，真倒霉！我刚要睡着，这首曲子就响了起来，每天清晨5点半，准时得很。一星期七天，天天如此，不让人有片刻喘息……。现在我真烦透了这首曲子，以前我对它曾那么钟情。……事物总是要走向它的反面……红卫兵，阶级敌人……大概没有一个反革命有我这么痛恨这首曲子。这不是音乐，这是对人的摧残，我卧室窗外的松树杆上给安了一只高音喇叭，曲子就从里面没遮拦地泄出来。它快把我弄疯了。这所学校还有没有一个能睡觉的地方？不受高音喇叭搅扰的？恐怕没有。

黎明时分，学院的每个角落都沉浸在这首震耳欲聋的乐曲声中。老师、学生、工人、家属，都不得不就此醒来。北京其它学校的情形也大同小异，东方一红，每个人都必须早起。

高音喇叭里的广播，一已开始，没两小时别指望它停下来。乐曲过后紧接的是新闻联播，然后是本地新闻，各种声明、宣言、通令、最后通牒、节选的大字报等等，没完没了。

我的头用被子蒙住，藏在枕头下，还是不管事，声音硬是钻进耳朵里去。我的脑袋像是一个战场，顽固的声波和我的瞌睡展开一场殊死的搏斗，搅得我头疼欲裂，忿火中烧，神志濒于崩溃。

“打倒某某某！”

“砸烂某某某狗头！”

我恨不得砸烂这个喇叭！把它踩扁，踢出墙外。这下它就哑巴了，让它躺在阴沟里像个没人要的夜壶，让它烂掉……

“工人阶级，起来夺取政权！”

“革命人民……提高警惕！”

“反对……破坏……阶级敌人……”

如果他们逮住我砸这个喇叭，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现行反革命，当场抓获。他们会开我的公审大会，游街，判处死刑……那又如何？完事之后，砰地一声，一了百了。死人可就听不见音乐，我于是长眠不醒，多美妙！

这个学院的红卫兵司令，他居然也会自杀。这件事神秘秘，谁也说不出个究竟。有人说他患了严重的失眠症，准是这病把他逼疯的，不然一个有为青年，率领着学院里上千名战无不胜的红卫兵小将，怎么会从校园主楼的楼顶纵身一跃而下？在一个绚丽的早晨，在一大群目瞪口呆的观众面前，他扑向绯红的云际，以一个极漂亮的跳水动作落下，像是要夺取一枚奥林匹克金牌。他这个姿势一直保持到坠落在20多米下的水泥道上，目睹的人都说这简直不可思议。

他手臂折断了，头骨摔破了，颈椎错位了，大量内出血，但他却没有马上断气。他大口喘气，大声呻吟，疼得全身是汗。人们将他送往医院，两个小时后他终于死了。这两小时一定是他长眠之前最恐怖的一段时间。

如果魔鬼能教我怎样使这个喇叭沉默，我情愿把灵魂出卖给它。使它接触不良？从里边切断它的金属线？拉掉它的磁铁？……怎么才能爬到树上去呢？什么时间做这件事最好？午夜过后，星月无光，风高放火，月黑杀人，我的祖父和曾祖父，你们干嘛不教我几个恶毒的诡计！

我的脑子里转了千百个念头，有许多荒诞不经。幸好我还残留了一点儿常识，没有把这些想法付诸行动。两小时后，广播冲破了我瞌睡的防线，我起床了：头重脚轻，睡眼朦胧。新的一天还没开始，就已经被糟蹋得差不多了。

□ 来源：杨瑞：《吃蜘蛛的人》第15章：半透明之夜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